

（二〇一六年三月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追根溯源】	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米鹤都
【宦海沉浮】	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文革是怎样发动的	李海文
【往事非烟】	我有记忆：清华附中难忘的那一夜	王 昭
【千秋功罪】	中央政治局批周恩来丧权辱国始末	逢先知·金冲及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追根溯源】

红卫兵运动起源剖析之一——大院的精神文化

• 米鹤都 •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其发起者和初期红卫兵的主要组织者、领军人物大都是干部子弟。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之所以首先发轫于北京，而且是在中学，与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格外浓烈直接相关，更由于北京的干部子弟比较集中、中学生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大大超过大学生有着重要关系。因此，不了解北京干部子弟的成长环境和精神文化，即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就不可能理清初期红卫兵的思想脉络，这应当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关键点。

旧日的北京，是一个由四合院组成的文化古都。这种状态自北京建城后大约保持了几百年。在1949年以后，这种形态被改变了。各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这种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门归衙门、眷宅归眷宅，而是混成一体，办公区的周边新建了宿舍区，而这种宿舍区在外在形态上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楼房，在内在形态上往往形成一个小社会。有围墙的也好，没有围墙的也好，总之在大院内，往往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学都可以一并得到解决。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的新型大院出现了。“大院”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尽管身处大院的成年人以言传身教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基调，但它真正开始形成所谓的文化，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时。

根据战争时期的有关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即：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对此，各根据地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有这么三条杠杠。由于战争时期的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采取了随军的方式，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从原有的市民住宅中得到解决的。再有，战争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态。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伴随着供给制及其后的全民所有制产生的。

如前所述，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产生的。这和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相吻合。由于内战的因素，中国的这次婴儿潮比美、苏晚了几年。但到了“文革”前夕，在这批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子弟，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文革前出现了，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阶层这样一种社会力量。当然，在中央的示范效应下，各地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院，也都形成了几乎独立于整个社会的小社会。但是它们远不具备北京大院的那种政治内涵和文化，更不具备北京大院的那种潜在动能。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时尚和领风气之先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这里仅就与红卫兵这一主题相关的，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真实的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听到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或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外面的社会很美好，全中国儿童的生活是和他们的金色童年一样的。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里来的大批饥民，要饭的。我那时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门。崇文门南边是护城河，护城河边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饭的农民。我就跟他们聊起来，问他们是哪的？他们说从农村来的，如何如何……我们北京小学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是从有苏联阿姨照管的那种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过来的。他们过着这种生活，实际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了，他们都不信，但我信。（1）更有一些红卫兵，直到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不了解真实的社会是他们成长中的一大缺憾。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和观念，完全来自与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他们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惆怅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的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的思想很简单，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反正党让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让我当农民，我就当个好农民；让我当战士，我就当个好战士。一句话，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后来到四中，接触到一些老四中的学生，包括其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什么家。我的思想能不触动么？（2）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中的家庭出身已经五花八门了，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小业主，无所不有，他于是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文革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这一代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健康，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冲破了市民的奴气，中国社会诞生了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尊长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文革”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文革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的态势而非屈膝忍受。这一群体性格是与其心理状态密切相关的。

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健康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产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自大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社会的边界和个人的空间，是在膨胀和压抑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并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同时存在着宠儿和弃儿，他们的心理状态一定不同。反过来说，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建国后由于责任重工作忙，关键是其信念要求他们必须要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当然，这一点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这里仅指建国初期。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当年即使在一些非寄宿制学校，也有部分住校生。那一代的中小學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寄宿或住校的集体生活从小就伴随着他们的成长。同时，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也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或者是战场上的战友，或者是机关里的同事，甚至很多人之间都有着同学的哥哥姐姐，或者是哥哥姐姐的同学这样的关系。总之，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一般市民阶层或普通的居民区，是很难建立起这样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的。无独有偶，台湾的眷村文化，和大院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这一代大院子弟往往比市民阶层更注重集体精神。集体主义的教育，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父母和家庭间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我觉得这跟教育有关系，跟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关系。这些人为什么凑在一起就厉害，要单独相对，那就是个体力量的较量了，是对方比你强大还是比你弱小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个人的力量了。十个人加在一起，可能就是五十个人的力量，这就是区别。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这些人就都凑到一块儿了，甚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也是后来我们这帮人打架的基础。（3）

寄宿制虽然培养了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但是也阻隔了学生与社会广泛的交往而不接地气，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缺陷，就是其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这种认同感很强，使一些小院子弟（4）和即使没有经历过寄宿制训练的干部子弟，由于相互间共性的东西很多，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了。但是它也很窄，“文革”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和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文革”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大多数的群众。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中央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而言，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儿，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是一路货色，因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如出一辙，同质同源。（5）

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难免掺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也绝非旧日文人的形象，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的子弟，自幼崇尚的英雄主义精神尚未泯灭，那时宣扬的是集体英雄主义。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首当其冲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有了冲突就是一对一，而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说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痛打落水狗”的群体暴力倾向。（6）

王南生（王小点）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我们那时在部队环境中受的教育就是，要打架，就要打赢，否则就是怂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另一方面，如果真打了架，还让人家打了，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我们在座这些人的家长差不多都这样。我从小就感觉到，有时打架打赢了，虽然父亲也要揍我，可是给那么几下都没什么劲，要是被人家打了，那劲就大多了。（7）

在大院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绝非是学习好的乖孩子、班干部，而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王小点小时候就有一次一战成名的经历。他回忆：我们小学有一部分寄宿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那时候经常受学校里的市民子弟欺负，因为住校，周一来学校的时候都带点好吃的零食什么的，结果就经常被人抢。有一天，我把一些住校受欺负的学生召集起来说：我帮你们出这口气，但是你们不许跑，要助威。如果他们都上手，你们也得上。他们都同意了。那次，别人都没动手，我和那帮欺负同学的头儿单练，结果我把他给打了，打赢了。他们说，第二天要找人报复。那天我回家把我爸原来缴获的日本军刀拿到了学校，对他们说：你们谁敢上，我劈了他！（8）那次以后，王小点就声名远播了。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的一个区别就是打架与否。只要打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这观念和皇城文化传统的重文轻武有关，而且根深蒂固。而在大院文化中，打架往往只是形式，是非要取决内容，暴力在这种氛围中并不是笼统地被谴责的。由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真理，稳定政权同样

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建国初期及其后一段时间，崇尚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就势所必然。孩子们对于干部阶层中这种观念的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心理态度。中国传统上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推崇道学、文化的至上，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即使在偏远的农村，那些读过两天私塾、能识文断字、能写个信和春联的，大多是村里德高望重之辈。笔者早年在美国读书时，曾在一个建筑工地打过几天散工补贴家用。开始被分派搬运石材，虽然干过多年的重体力劳动，这活儿也算不得什么，但在工地上这毕竟是最累的。中午吃饭时，领班的大工聊天中知道了我在大学做学问，当时就把他的小工叫过去说：你们俩换换，你去搬石材。又对我说，下午你就跟我干。我看他那小工面露愠色，感觉很不好意思，忙说没关系，这活儿我能干。那个大工说了一句：你不用管。你是读书人，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让他们去干吧。这是一个从国内移民去的基层建筑工人，尽管经过“文革”的洗礼，但是他心目中对“读书人”三个字的敬慕和爱怜，仍然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深层意识。

实际上，几千年来，绝不仅仅是地主阶级供养着读书人，更多的底层劳苦大众也把社会道德文化、民族精神血脉的传承寄托于读书人，这或许才造就了中国文化得以延绵不断的内在机制和力量。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构，我们相信“读书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劳动者改造的。特别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名言成为一种结论之后，从此，“读书人”的地位大幅度地下降了，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反智”。但在“文革”前，就一般市民的文化心理而言，崇尚知识、敬重“读书人”的古老传统尚未殆尽。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于得突出政治的风气之先，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重工农干部轻知识分子干部，重权力轻文化的心理态势已然成型。因此在有些大院中，即使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往往被叫做“小知”，这怎么也谈不上是一种尊称。这种观念扩展到社会上，就开始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大院文化中，这一点要比社会上的认知来得更早，也来得更彻底。在1964—1965年发生的“四六八学潮”中，部分干部子弟提出的“宁要红二分，不要白五分”，就是一个典型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斗老师，也是红卫兵们开启先河，至“老九”彻底臭了之后，彻底的反智就出现了。

五、畸形的政治热

曾几何时，全国都流传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么大话都敢说。他们的切身体会，也许是从接触出租车司机开始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待乘客一上车便会从国际国内形势谈起，有些还分析得头头是道，能让人忍俊不住。今日北京开出租车的，大多数已成为郊区县的地农民，但是这个传统依然如旧。就是当今的老愤青们，可能也属北京为最，很多人调侃自谓“地油海心”，即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这和天子脚下的皇城心态有关，但不能不说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国家大事，个人生活也会政治化。他们会把热衷于家长里短视为市侩；把生活上精打细算看作庸俗；会把埋头苦读说成没出息，进而说成“白专”之路。干部子弟的关注点，一是类似“九评”那样的政治理论，二是属于父辈革命传统的掌故、战例。另外一种谈资，则是干部阶层的内参了。如未经公布的小道政治新闻，如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是1960年代他们中流传最广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文革前的一些中学生，甚至能把国家军队机构的领导人职务履历倒背如流，有些人对各级干部配备的汽车型号、待遇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领导干部的山头派系了如指掌。对于

后一部分谈资，出身市民阶层的学生，即使热衷于政治，也难于置喙。因为当年这些均属机密，根本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以学习来的内容。

“文革”前，确实有一批干部子弟成为了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小政治家，譬如“四六八学潮”中，一些高干子弟已经直接卷入到政治浪潮中去了，中学生直接找中央领导、也是自家的邻居汇报请示，中学生通过同学关系向国家主席、向中央书记处、向中宣部、向北京市委递送政治性的意见书，居然还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级内参的两度刊发。中学生这样的政治热，可以说是空前的，最好也是绝后的。而文化大革命的巨浪，让他们还真过了一把瘾，只不过并未变身为政治家而成为了政治工具。

在一定意义上，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阔，大院子弟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当然，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气、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多。

六、浓厚的等级观念

共产党人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在消灭阶级差别上着力不少，却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等级差别。干部评级时，中国的干部高低达30个级差，不仅过于繁琐，收入差别也很大。这不仅高于西方的文官制度，而且高于苏联东欧的差别。部队评军衔后，大院里的汽车、保姆，住房，肩上的星，都从隐形变成了显形。从还不懂事的孩子开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输各种等级制的概念。谁家长是部长，谁家长是局长，谁家长是13级以上的高干，谁家长是13级以下的一般干部；谁的爸爸是将军，谁爸爸是校官；谁家有汽车，谁家配了勤务员；谁的爸爸是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谁的爸爸是1937年以前的老红军；甚至同为少将，还要比比是哪一年授衔的少将……有个大院子弟说：像我们住的那些军队大院，部队里的那个三六九等，真的是太闹腾了。一进大院，什么军级楼、师级楼、团级楼，一层一层，见山见水。地方上的宿舍等级还不那么明显，到部队就不一样了。部队干部的级别待遇，真是可以用镊子夹着砝码一钱一钱的来称量的。（9）在不同的圈子里，这些表现有不尽相同的内容。但是，相应在市民阶层比比谁家穷谁家阔，在工人中比比谁的家长是几级工，大院中面临的等级问题不仅要广泛得多，而且具体得多。

这种等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没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对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如苏承德所说，它的延伸实质上也是一种血统论。如“四六八学潮”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员，最后就无形中成为由省部省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所组成。（10）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中，不少学校奉行谁爸爸的官大谁当头儿。这样的事例很多，不难看出等级观念的影响。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一些红二代聚会，也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辈的地位安排座次。

七、忠诚和献身精神

大院文化中，可贵的一点是，培养了一代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这一代人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对党的事业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把一切交给党”。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干部子弟也就是“党的孩子”。特别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教育中，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是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一代人往往不能将这种对党的忠诚升华到党的根本宗旨上认识，如邓小平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与很多人今天还自诩的“党的孩子”之间，就显示出了意识上的高低。

忠诚就意味着献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牺牲精神，为人类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在“文革”中较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强烈。曹都都回忆：即使当老红卫兵像弃婴一样被摒除

于社会主流之外时，我们还有信念，此时不用爷，自有用爷时。中国迟早要和美帝、苏修打仗，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这样的战争中当炮灰。受伤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大不了是八宝山多出一片坟头。我们心甘情愿做革命的“炮灰”。〔11〕

八、家国情怀

如前所述，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之一是心理优势。他们的强烈责任感是对父辈的事业、理念的投入。但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的责任感中，包含有一种敢于把“国事”视为“家事”的心态。这点和中国传统中褒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所不同，和市民阶层中提倡的所谓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样，它更像是传统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子”的心态，这不能不说是干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种天然强势。

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强了其对于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强了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担当精神。“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他们这种责任感与毛泽东密不可分，毛泽东即是这一事业、理想的化身。所以，他们发动红卫兵运动，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至个人迷信破灭后，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转化，以至于对毛泽东本人的“文革”路线提出了质疑。这种群体性格，也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关。

他们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优越感。这种教育发自老一代内心深处的真诚，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不要脱离群众”的本身，逻辑上就意味着主体就不是群众；而“要有群众观念”也绝不等同于“群众的观念”，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味其中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的烙印却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转眼到了红八月，干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红卫兵的行头，一身黄军装就披挂起来，凡是能够显示父辈尊贵的外在形式就充当了割裂他们与群众的道具。这当中的文化内涵是：我是革命后代，我和你们不一样。至此，所谓不脱离群众，就完全成为了空洞的口号。他们从小也曾被灌输了大量的艰苦朴素的教育，一度许多人以穿新衣服为耻，反以衣服打补丁为荣。但是，他们奉行的艰苦朴素、注意影响、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并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体验到老百姓真实贫穷所带来的那种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从来不能和真正的穷苦划等号。父母所没有向他们指出来的这些差异，最终还是害了他们。

刘辉宣谈到：部队子弟穿军装固然有它的不得已处，但以革命军人和高级干部在社会上的地位，干部子弟身着军制服时，仍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后来我们在与群众造反运动进行对抗时借势血统论，极其张扬地释放了干部子弟内心深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以对其他阶层出身的同学进行压制，其间更不乏无端的贬损和侮辱，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与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人的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得荡然无存了。〔12〕

比较起来，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似乎还来得更真诚一些。他们甚至以负疚、救赎之心，走入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同情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使他们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而真正能够走出聂赫留朵夫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在这代干部子弟当中尚属少数。而“文革”风暴一起，无论内在和外在，他们立刻显露出其痼疾，而脱离了群众。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伴随着“长房长子”的优越感，超出了“度”之后，其“嫡出”心态就必

然视平民群众为“庶出”，也就成为了血统论的温床。这是大院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一些今天还津津乐道于此的人，实际上仍然未能脱出旧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为了民众一分子的人，才能够实施其抱负，发挥出潜在的能量。

九、敢说敢干的性格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性格上的强势。当年这代人经常挂在口头上有这样两句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们在语言上更喜欢直来直去，在行动上更推崇雷厉风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讲究客气留面子，讲究利用语言艺术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甚至骂人时还讲究不带脏字。这种风格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显然已经陈旧，被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对于市井文化讲究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他们更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大院子弟在群体性格上，代表了这代青少年的转向，他们在表达方式上，趋于更直截了当。因此，在“文革”中，初期红卫兵不仅在“维护真理”方面旗帜鲜明，敢于申明主张，即使在坚持错误理念的时候，也依然毫不隐瞒地把它张扬到极致，如那幅“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他们在行为作风上，也同样如此。他们可以为维护正义拔刀相助，也同样可以把恶行发挥得淋漓尽致。

“敢字当头”，藐视权威，这是他们从父辈革命的经历中学来的真谛之一。问题的一面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强势性格的破坏性就会更大。因此在“文革”中，他们盲目地自信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盲目地自信所身体力行的“革命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语言的张扬跋扈和行为上突破多重底线，就成为了一种必然。另一面也源于此，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面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感觉轨道偏离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革命方向，于是勇敢地要求“清君侧”，率先集体起来反抗“文革”的代言人——中央文革小组。

十、人性和党性

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无论从家庭教育还是学校的制式教育都是如此。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文革”中也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划得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划得很宽。这固然是党的方针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与群众间的无形屏障有关。“文革”中，除了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的群体滥施暴力外，在对待干部阶层内部一些先行倒台的“黑帮”，落井下石和讲义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习性也同时并存。一些干部子弟能够舍身保护已经沦为黑帮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干部子弟，对几天前还是亲密朋友、兄弟姐妹的“黑帮”子女，立即划清了界限。不仅视如路人，甚至加以批斗和殴打。这种行为方式，革命性、讲原则是一方面，但同时忽略了人性中的一些底蕴。

在中央报刊点名批判“彭罗陆杨”之后，对这四家人率先上门横加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门熟路的中央领导人子女。这样的事情，就一般市井之民而言，即使能够做到，可能也还需要有段时间适应和过渡。但是，即刻发生的多起惨剧，在干部子女、而且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中却真实地上演了。陈小鲁回忆：当时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争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上爬。（13）不独有偶，另一批领导人子女则跑到罗瑞卿家造反，同样让罗的夫人郝志平在地上爬。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这种对人格的极度侮辱，怎么说都是非人性的。而这些领队的红卫兵，就在昨天还亲昵地把他们叫叔叔，今日就干出逼得阿姨在地下爬的勾当。红卫兵们对待昔日的叔叔阿姨尚且

如此，对待黑五类们更为变本加厉就是势所必然了。这代人的潜意识中，当人性和党性产生任何纠葛时，他们转瞬之间就会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人性。

十一、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从封建王朝向现代社会转进的过程，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的法律和契约都远不成熟。进入新中国后，党内在这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以董必武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力图将社会主义的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权力的不受约束而不予认可。于是19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战线出现了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大批法律工作者被肃清、被打成右派。另一方面，从此，党比法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见成为准绳的做法成为了长期事实。这一历史背景下，党内斗争必然首先影响到干部子弟群体，也就必然反映到下一代人的文化观念中。

相比之下，平民阶层的子弟，往往对此并不敏感，更多的还停留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观念的熏陶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评判中，很少有人会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诠释问题，而会首先强调党的利益、阶级分析来作为唯上和唯一的尺度。因此他们对法律意识的忽视，甚至对于生活中契约精神的淡漠，都远远超出了已然缺乏法律观念的同代人。这点和崇尚暴力的倾向结合，才会展现出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无法无天和残暴的一面。

十二、权威人格

本书前面已经谈到了权威人格的问题。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这种人格结构，是家长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社会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甚至会剥夺他人的权利。前述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即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循此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而形成权威人格。

综上所述，仅仅对大院文化做出一般性的概括，仅仅意味这是一种集合性的取向，绝非一概而论。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每个个体由于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识和理念的不同，即便同是一个大院的孩子，在“文革”中的表现依然差异很大。如初期对“对联”的辩论中，支持和反对对联的领军人物，则大都是干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复杂的表象。这里仅以“文革”初期为临界点，仅从红卫兵运动所涉及到的政治层面做一粗浅分析。其他如大院文化中的金钱观、讲义气、有担当、嫉恶如仇等等，不一一论述。

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和社会中既存的市井文化做一对比，在很多方面实际是五十与百步之差。由于社会的总体导向，应当说这些文化精神是红卫兵一代普遍具有的倾向，但身居大院的干部子弟在整体上领其风气之先，使这些特征在大院文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而恰恰是这些甚至可以说细微的文化差异，却驱动着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干部子弟群体，掀起了一股足以改变历史的巨浪。王冀豫谈到：大院文化同质同源，在传递方式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就导致最后形成了我们对修正主义教育的愤懑，形成对毛泽东的超级迷信。所以我觉得红卫兵运动跟这个有关系。过去的集体主义教育，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寄宿制学校培养的团队精神，在组织结构上追求家庭背景的清一色。其后血统论的出现，就更满足了我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这种结构是一种心理结构，当时以致到今天，这种思想意识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打不烂的。（14）

大院文化的这些内涵，在“文革”前夕和初期，特别在北京，代表着一种时尚和潮流，领取于社会的市井文化，起了一种超前的、示范性的效应。在北京地区，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和深入，随着红卫兵运动的传播，随着中央对红卫兵运动的充分肯定和支持，随着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随着红卫兵大串联对全国各个角落的冲击，北京的大院文化迅速地扩展并影响冲击着整个社会既有的市井文化。除某些不可模仿性的特质外，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迅速缩小。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一代人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没有大院文化，就产生不了红卫兵运动，也不会产生一代人文化精神的特征。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塑造，影响深远，其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需要未来的社会学家进行更深刻的分析。

本文节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修订版）》，部分内容已发表于《领导者》和《炎黄春秋》杂志。

注释

- 〔1〕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一，2011年。
- 〔2〕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之六，2015年。
- 〔3〕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 〔4〕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
- 〔5〕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 〔6〕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 〔7〕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 〔8〕同上
- 〔9〕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之六，2015年。
- 〔10〕米鹤都编，苏承德口述史。
- 〔11〕王南生口述史《文革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 〔12〕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撰《回忆与反思》之六，2015年。
- 〔13〕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二，2011年。张洁清，彭真夫人，笔者注。
- 〔14〕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之五，2014年。

□ 原载《共识网》

~~~~~

## 【宦海沉浮】

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文革是怎样发动的

• 李海文 •

打倒“四人帮”后很长时间，许许多多的问题困扰着我。

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中央政治局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之久的“文革”为什么是从改组北京市委开始的？工作组是谁派的，毛泽东知道不知道？“文革”是怎样从红卫兵运动走向打倒一切的？……我期待找到答案。

所以，当好朋友李丹林告诉我她父亲李雪峰想要写回忆录，问我愿不愿意帮忙时，我喜出望外。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访问过数百名老同志。他们对历史理解之深刻，常常令我不能望其项背。但是这些老同志或是司局、部长级的干部，或是中央委员，都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不清楚高层领导内部的分歧，以及党中央斗争的来龙去脉。

李雪峰则不然。他是中共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1966年补选）和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我看到档案，60年代毛泽东讲话，多是李雪峰记录的，他记得详细、清楚。1965年12月到1967年，很多高级干部或被打倒，或靠边站，而他一直工作到1971年初，一直参与中央工作。这六年，前三年是天下大乱、纷乱繁杂，难以厘清；后三年出现林彪集团，各说各的，扑朔迷离，认识大相径庭。

再者，从1972年被隔离后，他在反复的审查中一直在不断重述、回忆、思考这些事情。多年的反思，他寻根探源，将一些表面看来零散、无关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且，打倒“四人帮”后他没有官复原职，顾虑相对较少，且在改革开放年代一直密切观察、注视着社会的巨大变化，现在的回忆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上。

我想，终于有一位了解文革发动情况的中央领导人开口回忆，将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 ◇ 文革初期前的顺利仕途

从1925年到1933年，李雪峰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和教育学院整整读了9个年头。前者属于中等教育，后者属于大学。

1933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后，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在太行根据地抗战前线坚持了十年武装斗争，任中共晋冀豫区委书记、太行区委书记。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对太行根据地的工作的评价是：“要兵给兵，要粮给粮，要钱给钱。”

李雪峰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这是他一生的缺憾。他入党后一直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党内斗争，不了解其复杂、尖锐、残酷的程度。学生出身、知识分子的书生气、没有经历过大的党内斗争、性格缺少圆通……这些，都为后来种下祸根。

1947年，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中原局第三书记。解放后，中原局在武汉改建为中南局，他任第二书记。1954年，大区撤销，他到北京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6年的中共八大与1945年的七大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了。并且，赋予中央书记处很大的权力。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对此，毛泽东解释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跑跑龙套工作的。”

毛泽东要培养邓小平。1954年，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李雪峰等任副秘书长。当时几乎天天开秘书长会议，讨论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们是干事的，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酝酿八大中央名单时，邓小平表示不愿意做总书记，怕“不顺”。“不顺”，一是和副主席、党的接班人刘少奇，一是和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刘周的党龄、资历、年龄、威望，都在邓之上。对此，毛泽东讲得很风趣：“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央的秘书长。”他明确提出：“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北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成员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反而比一些政治局委员消息更灵通。

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为邓小平，书记为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共10人。其中，彭真协助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王稼祥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负责外事；谭震林是副总理，分管农业；谭政是总政主任，负责军队干部；黄克诚是参谋长；李雪峰负责工业。

李雪峰在八大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就直接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当时中央委员97人，中央候补委员73人，共170人。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加书记处成员，共31人。49岁的李雪峰在书记处书记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但是工作时间却是很长的。

1961年，成立了六个中央局，李雪峰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经常召开各大区书记会议，召开有各省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李雪峰兼任华北局书记，他经常参加这些会议。

1966年5月，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后，李雪峰担任了“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 ◇ 坎坷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李雪峰是1966年7月25、26日的万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这是文革小组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大区书记。这次大会后，红卫兵组织从秘密走向公开，红卫兵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群众运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召开大会的目的，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其实，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已决定撤销工作组。会场完全被康生、江青、陈伯达控制，数万群众的情绪为他们左右。

26日晚，大会临近结束时，江青突然走到一旁的李雪峰跟前说了几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要李讲话，李表示不讲），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并带头鼓掌。

李雪峰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他身材清瘦，风度翩翩，像儒雅的学者。全场屏声静气，看他如何回应。

只听他不卑不亢、不慌不忙地说：“工作组在你们那里，什么时候批判，什么时候要让他们来，他们就来。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对具体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工作组都是四面八方来的人，情况不明，随传随到，奉陪到底。”

这句“奉陪到底”，后来成为了他的罪状之一。

8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书记处增补了谢富治和刘宁一，但因邓小平受到批评，很快就停止工作。一直到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才成立了新的书记处。中间14年，中央没有书记处。

会前，中央文革小组已有取代书记处的趋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如康生、陈伯达等，各中央局派一副书记或常委参加。李雪峰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能毛泽东考虑到，中央书记处将停止工作，书记处的这些书记放在哪？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了陶铸、叶剑英等为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8月17日，李雪峰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撤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但是名义上还保持着这一职务，所以被撤职一事不为众人所知。实际上，他担任这一职务仅三个月。

虽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他的处境并没有改善，时常被炮轰，到处作检查。特别是聂元梓领导的北京大学一直不放过他，他走到哪，大字报贴到哪。但是再怎么炮轰，他一直没有被打倒，1967年1月，他到天津工作，边工作边检讨，这在六个大局第一书记（除1965年初逝世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外）中绝无仅有。1968年2月，河北省革委会成立，他任主任。九大上，他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雪峰1967年夏天在京西宾馆曾劝老战友秦基伟说：“现在挨轰，以后日子好过。现在工作的，将来可能没有好日子。”他不幸而言中。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由于“简报”事件，李雪峰后来被扣上林彪黑干将的帽子。华北会议后，1971年2月，他被隔离，在家软禁，后送到安徽囚禁。

#### ◇ 与李丹林的交往

认识李雪峰的女儿李丹林并成为好朋友，是在东北农场劳动时。

文革前，我们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但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我与她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丹林成了名人，在校园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1968年。这年夏天，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两千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丹林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丹林在一班，我在三班。很快，连队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

农场是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我们住在山坡上，井有几十米深，井绳有手腕粗，就是夏天也结满了冰。全班10个同学齐动员，不仅要给自己班打够水，还要轮流给厨房打水，最后要饮农场的牛群。十几头牛从不入圈，满山乱跑，一到晚上就到井沿来等水喝。它们喝水时都来了，干活时没影了。强壮的头牛跑得飞快，男生只能抓住落在最后的瘦弱之牛。但排长说：你们让牛干活，你们干什么？

艰苦的生活将大家的距离缩短了。丹林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

我真正认识她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在学校还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分，现在无一例外都成为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

我的父亲李琪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他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被说成反对江青。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父亲。不久，父亲自杀，离开了人世。因为父亲的问题，这三次运动我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

每到运动，丹林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备受重视。连队召开积极分子会，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鱼贯而行。丹林走在最后，却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招手，不断做着鬼脸。她是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对这种做法的反感。从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靠着丹林等人的鼓励、帮助，我才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

1970年3月，结束了劳动锻炼，分配工作。省里规定，大学生一律不准进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少同学都找关系回到了关内，丹林最有条件，却没有活动，分配到五常，而且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

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在通河，毕竟在县城教书，不禁担心在农村的她。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

再见面，已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北京月坛北街，妈妈说丹林来过。丹林说起，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划圈。我听了很难过。我赶去见了她。丹林带着一岁多的女儿，不多说话。女儿身有残疾，我才知道，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深受刺激。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1982年，丹林调到中央教育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我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

她告诉我，她父亲也回到了北京，就住在厂桥的中直招待所，一拐弯就到。

#### ◇ 初次拜访李雪峰

这是一座旧的三层小楼，李雪峰住在二楼的一间客房。屋里陈设简单。他仍然瘦削、文雅，与十几年前不同的是，因为不出门，穿着简朴随便，天热，他穿一件无领短袖背心和一条类似睡衣式的薄长裤。

我自报家门，一切都那么自然，我们谈天说地，一见如故。他正在赋闲，等待结论，有时间和我闲聊，气氛轻松自如。他的夫人翟英言词之激烈，一点不亚于我们年轻人。

我从不主动提问题。这是从小在家里养成的习惯，不该问的不问。大人让你知道，自然会说；不让你知道，你问了，也白问，还会挨批评。经历文革，我更养成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习惯。大家说南道北，李雪峰看似不经意讲出的故事，真实而令人惊奇，听得我目瞪口呆。

1983年，李雪峰做了结论，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离开了招待所，搬到了南沙沟。当时，我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写周恩来解放后的历史。中共八大书记处书记中只有李雪峰没有官复原职，比较容易见到，因此列入了我们的重点采访对象名单。

我带着周恩来研究组的人到他家拜访。他正在花坛边舞剑，一招一式，动作标准、到位、轻松，舞姿矫健、优美、飘逸，完全看不出已是古稀之年。原来，他51岁时生了一场重病，休养期间，向名家学了太极拳、太极剑，从此身体渐渐好起来。他毅力惊人，每天坚持练剑，还天天坚持洗冷水浴，一直坚持到90多岁。他活到97岁，与此有关。他看见我们来了，收起剑，将我们领回家。

屋子里，几乎家徒四壁。他没有平反，没有官复原职，这在6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中仅此一位。因为不是平反，不补发工资。经历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将钱看得很淡，没有攒钱的习惯，又要接济亲朋故旧，平日开销大，也存不下钱，自然没有财力置办家具。但他安之若素，精神很好。

他热情接待了我们，但讲话很有分寸，不轻易讲什么，特别是到关键的地方，宏篇阔论，听得我们云山雾罩。回来整理记录，发现他谈了很多，却又什么都没说。访问无功而返。

#### ◇ 整理回忆录

一晃10年。1993年，丹林来找我，说他父亲要写回忆录，关键是文革这段，问我愿意不愿意帮助整理。真是天赐良机！我喜出望外，欣然接受。

1993年12月21日，我们第一次谈。李雪峰说：“1978年回来，‘摆’了四年，不会客，不出门，守纪律。我按照列宁的话，能创造历史还是继续干，不能创造历史就回到书斋，可以考虑留个材料。”这年，他86岁，心脏安了起搏器。

第二天早上，李雪峰照常在家里打太极拳，突然晕倒。幸亏倒在沙发上，无大碍。我闻讯后，十分不安，给丹林打电话：“你爸爸要是出了事，我就成罪人了。”没有想到她竟爽快地说：“海文，如果爸爸出了事，我们庆幸你帮助他终于留下了材料。不然我们才后悔呢。”她的一句话，使我的顾虑涣然冰释。

从1993年底开始到1994年夏天，李雪峰跟我谈了9次。参加者还有夫人翟英、秘书赵春伟、女儿李丹林、丹林的妹妹李谷丹。翟英常常插话，提醒、补充。丹林、赵春伟负责录音，谷丹照相、后勤。

虽然李雪峰手边没有任何资料，说自己两手空空，但他满腹经纶，博闻强记，记忆力好得惊人，如数家珍。他对日期、对过程记忆之准确，对人物神态描述之生动，呼之欲出。我常常听得入迷，时时感到心灵的震撼，感到经历战争、生死考验的那一代老共产党员的气度、胸襟。

他的回忆，从1960年开始。他的叙述准确、鲜明、概括、凝练，从不拖泥带水，保持着高级领导人的风格。所谈的这些事，件件都是鲜为人知的。

他谈到四清中的争论，高级干部对桃园经验的不满。我明白了，为什么事隔十几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专门写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他还谈到了1966年3月、4月和6月的三次杭州会议的情况以及派工作组的前因后果，谈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讲话（即“五一八讲话”）中的失态之举。

他谈到，7月，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顶刘少奇、陈伯达与邓小平发生争吵，江青从后面蹑手蹑脚进了会场，将这一切全看在眼里。

他讲述了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始末。他提到，在会上，许多人对姚文元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导致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自杀的原因，不仅是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的支持“联动”，还有在这次会上对群众列席会议提了意见。

他还谈了8月1日和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谈了陶铸、王任重被打倒的缘由。他提到，两次生活会上，林彪整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停。

他的回忆，基本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过程说清楚了。这是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成员中留下的唯一关于文革初期中央情况的回忆，弥足珍贵。

谈话后，我整理了录音，核实、增加日期，根据当年文件将引文补充完整，补充背景资料。整理时，我尽量保持他的语气、用词，生怕换个词，会改变其意。

整理成文，完成第一稿，李雪峰基本满意。丹林将她1990年录的20多盘录像带也交给了我，我从李雪峰早年的秘书黄道霞那里又拿到了李雪峰当年的工作日志，根据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补充。



1996年，整理工作基本完成。李雪峰又请原华北局宣传部长张铁夫、秘书黄道霞修改，后又请人民日报主编李庄看过。这个回忆录是众人劳动的成果，我仅是整理者。

1998年，全书定稿。此时，我已调入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和《百年潮》副主编。这年10月《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和《回忆“文革”初期“五十天路线错误”》分别在这两个刊物发表，引起轰动。各个报刊纷纷转载，众多专著引用。同时，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李雪峰回忆录（上）——太行十年》，一切都在有序进行。

后来，《李雪峰回忆录（下）——文革十年》的出版搁置。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逝世。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

【往事非烟】

我有记忆：清华附中难忘的那一夜

· 王 昭 ·

1966年8月，我17岁，是北京清华附中高652班的学生，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那时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有理”，他们掌权统治了学校，批斗校长、老师，有的同学也被批斗，校园里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的气氛。

记得8月8日那天，我走进教室，心惊肉跳的看到，墙上贴满了批判老师、同学的大字报。“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对联从房顶一直拖到地上，在一张浅黄色纸的大字报上面用醒目大字写道：“杨爱伦，你这个继承资产阶级反动房产主衣钵的狗崽子……”大字报里的内容前所未闻，并充满了上纲上线谩骂，类似的大字报还不止一张。看了大字报我很惊诧，杨爱伦曾是我们班的班长，她品学兼优，正直热情，是个学习好、唱歌好的漂亮女孩子。她怎么被批判成黑五类狗崽子了？她的父母怎么从教师变成资产阶级反动房产主了？她为什么遭到红卫兵的批判？同学之间有什么恩怨要这么上纲上线整她呢？

当时我自己在班里的处境也不好，因曾是团支书而被红卫兵称为修正主义苗子黑帮爪牙，没有人敢理我，我只能一个人独往独来，我们是住校生，不能回家，感到孤独、抑郁，政治压力很大。在那个人与人互相揭发互相斗争的残酷年代，我当时不可能找人了解杨爱伦的情况，只能默默地观察着。

晚饭后，我一个人在学校操场上漫无目的走着，听到大喇叭里正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回到教室，看到一群人正在教室里，杨爱伦站在中间，周围有红卫兵及一些同学群情激奋的说着什么，我进来时他们正好结束，陆续散开了。

后来听同学们议论说那是红卫兵在批斗杨爱伦，她主要“罪行”是修正主义苗子黑五类狗崽子，资产阶级孝子贤孙，还打击革干子女某某某。某某某是我们班的红卫兵头头、班文革领导核心组组长，响当当的红五类出身。

杨爱伦过去在清华附上初中时曾任班长，1965年刚上高中时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她是知识分子平民家庭出身。早在文革前，班上有的革干子弟就认为，班干部、团干部都应当由干部子弟来担任，否则就是偏离了党的阶级路线。我们班在进行班委会选举时，有的革干子弟极力做工作，要把红五类出身的某某某推选为班长，顶替非红五类出身的杨爱伦。杨爱伦并不知情，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谁当班长”与阶级路线连在一起。文革开始后，有人揭发说杨爱伦曾说过：某某某看到XXX（我校红卫兵头头）的时候眉毛一挑一挑的。这话被上纲上线为打击革干子弟。红卫兵说杨爱伦是黑五类狗崽子修正主义苗子，有资产阶级思想，打击革干子弟，对她开展了阶级斗争。

若干年后我才听说，在批斗杨爱伦之前，班里有两个红卫兵头头曾专门到林业学院杨爱伦姐姐家，去找在那里休息的杨爱伦谈话，让她检查交代自己及家庭的问题，让她揭发老师、同学的反动言行，尤其要揭发教导主任谢德芳及团支书的问题。并对她说：“并不是想整你，要整的是团支书，只是让你揭发，但你态度不好……”那时杨爱伦才知道她们是有计划的整人，只是还没开始实施。后来杨爱伦回校了，被带到教学楼的一间小教员室，让她单独在那里写检查揭发，门口有班里红卫兵专人看管，不许出去，上厕所上食堂也被班里红卫兵押着；在被押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人向她喊“反革命低头认罪！”，有的初中班的“朋友”向她侮辱谩骂；宿舍里她床上的东西被随便乱丢，床上贴满大标语，什么“小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那些天她尽管感到压力很大，但还是写不出让班里红卫兵满意的检查，她不愿说假话故拒绝揭发别人。

红卫兵对她的批判逐步升级，但具体是怎么筹划的只有班里红卫兵头头们最清楚。我们只知道8月8日那天晚上批斗她，是由班里两个穿黄军装系皮带的女红卫兵揪住她的两个胳膊把她押到教室的，在“反动派不投降就叫她灭亡”的口号声中，批斗会由班里一个矮个女红卫兵小头头主持。红卫兵们让杨爱伦揭发万邦儒、谢德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反动家庭；对她指责谩骂，喊打倒她的口号，扣上一堆政治帽子；按着她的头让跪下低头认罪，还从后面踹她，杨爱伦挣扎着不低头、不下跪……

据说学校红卫兵一个头头曾到我们班说过杨爱伦太强硬了，批斗她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

那天晚上他们批斗完散开后，我坐在教室里默默看书。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班红卫兵头头某某某急忙忙走进来，她说杨爱伦不见了，然后让同学们分头到楼前楼后、院内院外去找，让有自行车的同学单诗敏和我一起骑车去林业学院杨爱伦的姐姐家寻找她。

已是深夜了，细雨绵绵，我们俩冒雨骑自行车出发了。我们从清华附中西边的小马路向南走，路很黑，没有人，旁边一侧是圆明园黑乎乎的土山影，只听到雨打树叶沙沙的响声，我们一路无语，心情沉重，除了对夜路的害怕，对杨爱伦的担忧，还有对社会上斗校长、斗老师、斗同学的恐惧，不知哪一天会斗到自己头上，但为了寻找同学只能给自己壮胆往前走。

我们使劲蹬自行车，向着五道口方向走，快到五道口时有一条铁路，想到前几天曾有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卧轨自杀，我心里顿时更感觉恐怖。这时前面不远处出现几个大学生，隐约听到他们在议论好像一个女学生卧轨，我们赶过去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却不说了，指着远处汽车尾灯红色的亮光说人拉走了，不清楚什么事。

我心里忐忑不安，感觉全身发冷，好在不远就是林业学院的大门，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斗篷雨衣的警察正在传达室窗外打电话，直觉让我们立刻奔了过去。警察拿出一个钱包让我们

辨认，钱包里装有清华附中食堂的饭票，我们一眼就认出这个钱包正是杨爱伦的。警察告诉我们，由于这段铁路出过事，火车司机开得很慢，刚才突然发现一个白色身影奔了过来，马上刹车，人竖着倒在火车下面的铁轨中，人受伤了已送往北医三院。

我们到北医三院时，杨爱伦已经被送进手术室，从门缝可以看到手术室地上有一堆沾满鲜血的浅色衣服，正是杨爱伦的。

医院做手术的医生出来告诉我们，杨爱伦所幸是竖着倒在铁轨中，但她的一个手被火车压掉两个手指，她的脸颊被火车下的铆钉掀起一大块皮肉，手和脸的残疾是难免的。这个医生很正直、富有同情心，他说这个女孩很年青，长的也好，受刺激精神恍惚了，为了少留疤痕，他缝得很细，手术用的时间比较长。

我伫立在手术室门外等候，望着绵绵细雨的黑夜，想到杨爱伦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冒雨从学校里逃了出来，在漆黑的夜里去撞火车，我心里感到无限悲哀。杨爱伦的身体留下了终身残疾，心理受到了极大伤害，一个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摧残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脸上缠满了白色纱布、身上盖着白色床单的杨爱伦躺在手术床上被推出了手术室，她还没完全苏醒，被送往病房。

我们回到了学校，班里批判杨爱伦仍在继续，最醒目的是红卫兵写在教室黑板上的“闪电报”，说杨爱伦自绝于人民！红卫兵小头头在教室前面给同学们训话，她声色俱厉的说杨爱伦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自杀是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让大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必须与她划清界限。

后来听医院医生说，班里红卫兵要揪杨爱伦回去批斗，但被医生挡了回去，医生保护了她，说她伤没好，不能回去。

.....

令人难忘的那一夜已经过去四十九年，文革早已被否定。我们已经六十多岁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各自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清华附中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了，似乎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当年的红卫兵施害者很少有人反思反省，更没有忏悔，除了刘向彤同学以外没有人向杨爱伦道歉。

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说法，例如有当年的红卫兵现在的史学学者说“清华附中高652班的杨爱伦。她在8月8日自杀未遂，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及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清楚”。“据我向高652班的同学了解，杨自杀前并未遭到‘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那两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学给她贴了大字报。具体因为什么问题，及杨本人当时遭受到何种压力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这些不尊重历史事实、推卸责任的说法很令人诧异。杨爱伦被压掉两个手指是否轻伤暂且不谈，她受到班里红卫兵的批斗和关押是事实，她被批斗后精神错乱去撞火车也是事实，怎么还说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呢？而提供奇怪信息的“高652班同学”有可能是至今不认错的当年的红卫兵施害者，也有可能是确实不了解情况的同学。这些奇怪的说法促使我要讲述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作为亲历者，应该将我知道的事实公布于众。

我在清华附中文革中亲身经历的那一夜尽管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那时所发生的事情仍历历在目。我讲述这段往事不是针对某个人，也不是要追究某些红卫兵施害者个人的责任，

而是要把发生在清华附中文革的那一夜记录下来，我所讲述的是文革中无辜同学被迫害致残的事实。文革是诱发人性恶的罪恶运动，扭曲了人性，残酷无情，给个人、家庭、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是一场浩劫！

我感到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要尊重历史事件的事实真相，历史不能掩盖，教训不能遗忘。

王昭 2015年7月

~~~~~

## 【千秋功罪】

### 中央政治局批周恩来丧权辱国始末

• 逢先知 • 金冲及 •

一九七三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是：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十一月十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抵达北京，这是他同年的第二次访华之行。这以前，基辛格在二月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基辛格在十一月再次来华，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并达成默契。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

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以后几天里，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谈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几个具体建议，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只是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从当月二十一日起开了几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叶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

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

也整了我。”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另一件事，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

这件事是毛泽东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那次会由他主持召开。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动？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第二天，他找了政治局几个人谈话。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第三天，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第四天，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

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他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又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还谈到“儿童团”问题，是指起用王洪文这些人而言的。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最后，他对军队干部说：“要准备打仗！”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几乎同每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

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

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在讲话中主要还是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又谈到国际问题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接着又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他回过来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长了，说：“唱个歌吧！”毛泽东说：“就散了啊！”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隔了四天，毛泽东年满八十周岁。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陈士渠回忆见到毛泽东那天的情景：

“那天（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客厅，便看到毛主席端坐其中，两边分别是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另外还有王洪文、张春桥等。同一九六九年相比，毛主席明见衰老，声音、动作也显得缓慢了。几年前毛主席虽然身



体发胖，但动作、反应仍很敏捷，也不显得老。而现在他已然是一位老人了。这与他直接领导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关系的。”

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毛泽东心里更清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话成为他常对人讲的话。

在“壮心不已”的毛泽东看来，“反修防修”仍是国内压倒一切的“大事”。他担心那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军们“少文”，希望他们能够像读懂古典小说《红楼梦》那样读懂中国的现实政治，说到底，也是为了这件事。

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力难从心的这位老人的内心却变得愈来愈矛盾，也愈来愈沉重了。

□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